

蕭公權文集

康有为思想研究

汪荣祖
萧公权
著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蕭公權文集

康有为思想研究

汪荣祖 译
萧公权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48-794-X

I. 康… II. ①萧…②汪… III. 康有为(1858~
1927)—思想评论 IV. B2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49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销售热线:010-64631547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4.375 字数:500 千

版次:2005 年 7 月第一版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弁 言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乃是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国家富强的追寻，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寻求。是以康有为既是热情爱国的改革家，又是沉思于遥远的乌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读者或以为这是一种矛盾现象，甚或指责作者未能妥为调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既不在同一层次，便无矛盾可言。萧先生已在书中明说：

这种不相同的见解并非不一致，而仅仅显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的范畴，超越既存制度与价值观。

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见本书 67 页)。

这一段话足以化解认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团。

萧先生在这部书里,时而作广泛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观察,因而每能见微知著。例如他首发康氏深受陆九渊与王守仁的影响;又如他首先指出康氏《物质救国论》实已发陈独秀、吴稚晖等人的先声;又如他在述论康氏经济改革的主张时,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明治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学说时,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比而观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类此,展示了一种精辟的“宏观”。

精辟的“宏观”之外,还有细致的“微观”。在纵横的议论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证。诸如《大同书》成书的年代(见本书 34 页)、康氏与廖平的纠葛(45~46 页),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31~32 页)、对宗教的看法(76 页),都能推见至隐,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说,读者可以覆按。

萧先生虽着力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然于康氏的性格情怀,落墨无多,而神貌自显。当我们终卷之后,康氏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跃浮脑际,久久难忘。同时我们也不禁感叹,康氏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多“不幸而言中”,也不禁赞叹康氏对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见解,岂止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真切。例如他一再强调译书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参阅 258、357~358 页),以及政治改良与经济成功的密切关系(参阅 240、246、250 页)。他也见及工业化会导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来之前,工业化须不失为中国,也就是中国式的工业化(参阅 368 页)。类此识见,真可说是与时益新。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纪,终发觉必须回头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为曾经指出的道路。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

此书卷帙浩大,翻译费时,译者以一人之力,抽课余之暇,锲而不舍,勉强完成,殊无握管吟哦、斟酌字句的时间,无论在信、达、雅上,皆难臻理想的境地,愿海内外读者,不吝指正。

萧先生生前曾戏谓我曰,他的全集必是 Posthumous Works,不幸而言中,今屈指大师云亡已逝六年矣!

汪荣祖 谨撰于维州柏堡之白舍

1987 年 9 月 23 日

序 言

当我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另找研究题目时，担任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学院的助理主任梅谷教授(Franz Michael)交给我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那是由已故赖特(Mary Wright)女士在40年代末，得自康同壁(康有为之女)的家藏。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由于梅谷教授以及院中其他同仁的鼓励，我开始对康有为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恰在此时，康有为的外孙罗荣邦来我们的学院作访问教授，他不但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因而在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从事此一研究计划。早年当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戊戌变法一章时，我只看到一小部分的康氏著作。对他思想了解得不够，使我那时无法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我现在有机会改正一些从前的误解。

我的研究结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清华学报》、《崇基学报》上发表。我现在重印这些论文合为一书，以符合近代中国研究会同事们的期望。除了一些小改动外，文字内容如旧。第三章至第六章，以及第八章曾载《华裔学志》；第七章曾载《清华学报》；第十章与第十一章曾载《崇基学报》。只有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九章是新写的。由于写作期间前后长达十年，并以单篇论文发表，不是前后相呼应的章节，因此书中重复与不一致之处难免。我已尽力免除这些弊病，但不可能尽除。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

我写作此书的目标并不高，只想较为详细地检视康有为变法和大同思想的主要论点，并尽我所能将康氏思想与其所涉及所发展的历史环境相联系。希望这本书不至于是罗荣邦教授所编《康有为：传记和综论》(*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巨著的毫无价值的附篇。

我要在此感谢学院中的同仁，在我研究期间给予的鼓励和批评。我特别要谢谢梅谷教授首先建议这一题目，以及罗荣邦教授的慷慨相助。我很感激

三家学报的编者,允许我重新发表他们已刊载过的文字。我也要向郎玛格丽女士(Margery Lang)申谢,她精湛的编校技术,使有错误的原稿,转化成可资印行的文章。最后我要向戴德华(George E. Taylor)致个人的敬意。由于他的领导,使远东学院充满和谐而具启发的学术气氛。在这一气氛中从事学术研究,使我深感愉快而极有收获。

萧公权 1973年9月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目 录

弁言	汪荣祖	1
序言		1
第一编 家世与生平		1
第一章 家世		3
第二章 生平		12
第二编 哲学思想		27
第三章 儒学新诂		29
第四章 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		65
第五章 哲学的整合		92
第三编 变法蓝图		129
第六章 政治改革		131
第七章 行政改革		177
第八章 经济改革		203
第九章 教育改革		254
第四编 大同理想		277
第十章 到大同之路		279

第十一章 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	348
跋：现代中国与新世界	404
引用书目	407

第一编 家世与生平

第一章 家 世

康有为曾颇为得意地说：康家十三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尝有一人执过其他的行业。^{〔1〕}这一说法并不很实在。从他家世看，19世纪前并未出过著名的学者，而且有些族人绝不是士人。^{〔2〕}康氏大约在南宋时自南雄迁至南海，住在西樵山北麓的银塘乡（又称苏村）。首先择居于此的康氏祖先康建元，身世未明。康惟卿（建元后第九代）始读书。康涵沧（第十三代）曾在湖南任幕友职，时约在清初，有为认为他是康家“创业传绪之祖”。^{〔3〕}

康家的地位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时，逐渐上升。康世尧（第十五代）“为儒为吏”。直到康辉（字文耀，第十七代）才于嘉庆九年（1804）通过乡试，稍有文名，后来成为极具声望的教师，前后有生徒千人。他尊崇程朱学派，并建立第一个祖庙，纪念惟卿公（康家第一个学者）。有为曾说：“吾宗以孝弟为礼学，昌自公始。”^{〔4〕}

康式鹏（文耀之幼子、有为之曾祖）承继了家学，然他不再固守程朱学派，亦尊崇极受陆王影响的刘宗周。式鹏有子四人，除第三子自修生平未详^{〔5〕}外，余子曾任小官。学修候选知府，道修“高行而笃学”，佐治耒阳县（湖南

〔1〕 康有为：《自编年谱》（以下引作《年谱》），页1；Jung-pang Lo,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p. 23；Richard C. Howard, “K'ang Yu-wei (1858 - 1927): 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 pp. 296 - 300 简略地说明了康有为的家庭背景。

〔2〕 康同壁：《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补遗》（以下引作《补遗》），页75；Lo, *K'ang p.* 144, n. 2。另见康有为撰：《诵芬集序》，载《康南海先生文钞》（以下引作《文钞》），第五册，页33；又见《康南海文集》（以下引作《文集》），卷8，页1。

〔3〕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译者按：此文已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页502。

〔4〕 同上。关于康辉的进一步资料可看《留芬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5；又见《文集》，卷8，页3。

〔5〕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省);赞修(有为之祖)笃守程朱,中道光丙午(1846)举人,历合浦、灵山、连州训导(在广东省)。^{〔1〕}赞修长子达初,即有为之父,受业于朱次琦(以朱九江闻于世),后有为亦游于九江之门。达初曾任江西知县。^{〔2〕}

有为的祖上并非都是学者出身。达迁(赞修之次子)曾统兵数千于蓝山(湖南省)平乱,既而入知县,从冯子材入安南定乱。^{〔3〕}达守(达迁之幼弟)则营实业而不仕,虽然他亦颇通经史。^{〔4〕}式鹏两位长兄(有为之曾伯祖)之一亦经营商业。事实上,据有为自谓,文耀的七十个后裔中,仅有十一人是“士人”。七十人中之十四人系文官或武官,由军职而入仕,九人在政府机构任职,但无科名。因此,自文耀至有为历五世(自十七世至二十一世),学者仅占康氏家族的少数。康有所提及的十三世族人(自第九至第二十一)中,学者所占的比例,也不见得比从事其他行业的来得高。^{〔5〕}

有为对他祖先从事学问之估计虽不确实,但未尝没有意义,对其家族作学者式之尊重,反映了他自身的志愿,以及自我激励。

他并不是认为非学者身份的族人对他没有好处,他特别感激其中二人。一是懿修(又名国熹),为其叔祖之一,以布衣募集壮士,与红巾战,平定南海及邻近三县,以军功而受知于左宗棠。懿修虽非学者,然亦好学,他藏书万卷,有为自小涉猎,自谓“得博群籍,赖公书”。^{〔6〕}另一人是国器,即懿修之幼弟,在道光季年从军。当太平军于咸丰初进攻江西时,“募兵拒贼”。不久转战于江、浙、闽、粤间,所向有功。咸丰七年(1857)累迁至广西布政使,十年(1860),护理巡抚。^{〔7〕}他是有为族人中惟一得此显荣者,有为曾说:“吾宗光大自公为之”。^{〔8〕}懿修藏书以供有为阅读,国器则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境遇让他俯读和仰思。同治四年(1865)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衣锦回里。^{〔9〕}他建筑了华丽的亭园和房舍,使乡里生色。所建两万卷书楼与澹如楼乃有为

〔1〕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有关有为祖父的进一步资料可看《连州遗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6;又见《文集》,卷8,页12。

〔2〕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柯劭忞:《清史稿列传》,卷220,页3~4;《清史列传》,卷62,页21~28;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39。

〔8〕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9〕 同上。并参看《年谱》,页2;Lo, K'ang, p. 25。

常到之地。光绪十年(1884)有为即在澹如楼首次获得哲学上的启悟。〔1〕

同治四年,有为八岁,在欢乐中过其童年。他的聪慧赢得长辈们的喜爱,使他能分享许多乐趣,如宴会、音乐、游戏,以及于同治五年亲见新楼之起。〔2〕他生平首次体会到豪奢的生活。不过这种生活并没有断了他追求学问之路,反而更加提醒他,犹如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制力”(Epicurean urge)始终出现在他的一生中,凭添了他的思想和行为的色彩。

他童年的快乐岁月并不很长。同治七年(1868),他仅十一岁,父亲便已去世。〔3〕一家生计的担子都落在他的寡母身上,〔4〕外家原是七世素封。〔5〕他与他的母亲及幼弟在很不宽裕的情况下,共住了几年。光绪六年时,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6〕

有为对他母亲的敬爱,自不待言。他长久感恩于她,特别是他幼年多病而得到她的照顾,以及她对他的支持和严格的管教,即使他成年后亦如此。她用她的私房钱作家庭开支,事事不让他操心,使他能全力读书。她对他早年的引导和鼓励,对他一生的事业尤其有助。民国二年(1913),他母亲逝世后,有为曾回忆道:

为少读书无宦情,不欲就科举。母强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违。”及光绪乙未成进士,则曰:“宦途多危,吾欲常见汝,不可仕也。”〔7〕

她不是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有为在民国二年回忆道:“为年虽五十,举动起居,少失礼,必面遭,不少宽。”〔8〕我们可以说,他的母亲以及姊妹的性格和才智使有为敬佩,以致使他相信,女人的人格和智慧不下于男人,终于得到他的结论:传统对女人的看法必须修正。〔9〕他爱他的母亲,使他在逃亡

〔1〕《年谱》,页5、6~7;Lo, *K'ang*, pp. 39-42.

〔2〕《年谱》,页2;Lo, *K'ang*, p. 25.

〔3〕《年谱》,页3;Lo, *K'ang*, p. 26.

〔4〕《年谱》,页3;Lo, *K'ang*, p. 26.

〔5〕康有为:《先妣劳太夫人行状》,载《哀烈录》,卷1,页3.

〔6〕《年谱》,页5;Lo, *K'ang*, p. 36.

〔7〕《哀烈录》,卷1,页2~6.

〔8〕同上,页5.

〔9〕同上,页18~22,《仲姊罗宜人墓志》。参阅《年谱》,页3、8;Lo, *K'ang*, p. 28. 据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康有三姊妹,两个年长于他。大姊最聪明,但三岁即夭亡。二姊逸红和三妹琼瑶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

期间常以母为念，一有机会，即往侍母。〔1〕

有为很少提及他的父亲。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其父短暂的一生中，游宦福建和江西两省，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有为的祖父以及叔伯们负起他早年读书的责任。他尤与其祖父亲近，像其他传统式的中国祖父们一样，对于长孙特别垂爱，〔2〕事实上是有为的老师和伴侣。同治七年(1868)的春天，他父亲刚去世不久，有为就开始积极地读书。如有为所说，他的求知欲和进度都使他自己感到满足：

公(祖父)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是年)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戾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篝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阅邸报，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3〕

一年后，当他十二岁时，祖父开始教他写作制艺文，他援笔辄成，但并不好之。〔4〕

他的祖父既是风趣的友伴，也是认真的老师。这位年老的连州公常带他到附近风景区散步，并告诉他先贤的生平和学问，诸如两庑之贤哲、寺观之祖师，以及碑帖诗文中才名之士。有为深受这些故事的启示，而自比某些先贤。有为说：

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志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倏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5〕

有为其祖父引导，初知理学，得窥史事，植下综合论的种子，奠下好学之基，并形成他终生不移的自信心。不过，他有一事与乃祖不合，即不愿写八

〔1〕《年谱》，页27、28、29；Lo, *K'ang*, pp. 138-139。另见《补遗》，页23、24、42、44、50。参看Lo, *K'ang*, pp. 103(未提到有为回到香港看母亲)、195(未提及他的母亲)、211(赴澳洲前回香港看母亲)、214(康带他母亲到马来西亚槟榔屿)、217(他从新加坡到香港探视母亲)。

〔2〕康赞修：《闻长孙有为生》，载《文集》，卷8。

〔3〕《年谱》，页3(同治七年)；Lo, *K'ang*, p. 28。

〔4〕《年谱》，页3(同治八年)；Lo, *K'ang*, p. 28。

〔5〕《年谱》，页3(同治八年)；Lo, *K'ang*, p. 28。

股文以应试。同治九年(1870)祖父发觉他不好八股文,于是专督责他为此业。〔1〕

有为的两位叔父也曾教他读书。知他早熟,他们在他祖父教他之前,已开始教读。由于他们的教导,他五岁时已能背诵几百首唐诗。〔2〕达菜(他父亲的堂弟)开始教他为文和读《书经》。难懂之处读几遍就可以记得,那时他只有八岁。〔3〕达节(国器之子)教他作文,从同治十年(1871)至同治十三年(1874)时教时辍。〔4〕有为对他二人都甚感念。

有为对他的惟一弟弟有溥(以广仁名世)亦敬爱有加。他比有溥大九岁,光绪六年(1880)一度曾教乃弟读书,堂弟有铭和有需也参加,教的是经史,并引导他们读旁的书。〔5〕有溥和有需后来积极参加变法。有需曾负笈美国多年,并曾于本世纪初参与宪政党。有溥则在北京加入变法运动,帮有为提建议、作顾问,并创办女校,以及其他改良活动,包括上海的反缠足会。〔6〕有溥于戊戌(1898)死难后,有为哀恸逾恒。两年后,当他流亡新加坡时,特请友人到北京找回有溥的遗骨埋葬。〔7〕

有为于光绪二年(1876)与张妙华结婚。〔8〕他十九岁,她二十二岁。〔9〕他大多不在家,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从戊戌年他出亡外国到宣统元年(1909)她与他在槟榔屿(Penang)重聚,其间十余年她一人照顾他的母亲和全家。民国四年(1915),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资助康梁的反袁运动。〔10〕她受他的敬重可见之于民国十一年她去世后,他“执紼送丧,悉如古礼”,并铭其墓。〔11〕

〔1〕《年谱》,页3(同治九年);Lo, *K'ang*, p. 28(1870)。

〔2〕《年谱》,页1(同治元年);Lo, *K'ang*, p. 24。

〔3〕《年谱》,页1(同治四年);Lo, *K'ang*, p. 25。

〔4〕《年谱》,页3(同治十年)、4(同治十三年);Lo, *K'ang*, p. 28(1871), p. 29(1874)。

〔5〕《年谱》,页5(光绪六年);Lo, *K'ang*, p. 36(1880)。

〔6〕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7〕《补遗》,页3;Lo, *K'ang*, p. 184。

〔8〕《年谱》,页4;Lo, *K'ang*, p. 32。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80引康撰墓志铭,她的名字是云珠,妙华是她的字,她与有为订婚时,有为年仅八岁。

〔9〕《补遗》,页85。Lo, *K'ang*, p. 240。提及她死年为六十八岁,但略过了此处引用之资料。

〔10〕《补遗》,页64;Lo, *K'ang*, p. 229。

〔11〕《补遗》,页85。Lo, *K'ang*, p. 240未提及此。

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纳妾,〔1〕因他已四十岁而尚无子嗣。〔2〕十年后,他在美国时又纳一妾:何旃理系一粤籍留美女生,因见到他的相片而仰慕他,自愿为妾。她陪他旅行,做他的舌人(通译)和秘书。〔3〕当她于七年后(1914)二十四岁时死去,有为写了《金光梦》以资悼念。〔4〕他纳妾显未符合他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5〕不过,他并未违反当时被接受的传统。身处社会的理想国未来到之时,他觉得不妨从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俗。

他经常提到他的孩子,尤其是两个女儿——同薇和同璧,先后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6〕他甚是爱护她们,让她们受现代教育。她们常伴他在国内外旅行。〔7〕同薇翻译他所收藏的日文书,帮助他于光绪二十二年完成写作十年之久的《日本变政考》。〔8〕她嫁给麦仲华,麦氏曾编纂《皇朝经世文新编》,收了八十多位作者的变法文章,包括有为之作品在内。〔9〕有为说他的妻子选了这个女婿。〔10〕但很可能是他介绍这准新郎给丈母娘。同璧嫁给罗昌,罗是梁启超的学生,在庚子年(1900)曾参与反慈禧太后的阴谋。她于光绪三十年赴美途中,在日本与他相遇。〔11〕

同璧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春天与她的父亲在槟榔屿会面,然后陪伴他到印度、欧洲和美国旅游。光绪二十八年岁暮,当他在印度时,他要她到香

〔1〕《年谱》,页15;Lo, *K'ang*, p. 78。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93),她娘家姓梁,她是有为长子之母。

〔2〕他的长子名同钱,生于槟榔屿。有为时年五十岁,高兴之余,作了一首诗,载《不忍》杂志,六期,“文艺栏”,页54。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51、74。

〔3〕《补遗》,页41;Lo, *K'ang*, p. 210。

〔4〕《补遗》,页62;Lo, *K'ang*, p. 227。

〔5〕康有为:《大同书》,页193~253。另参看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卷9,页15。

〔6〕《年谱》,页5。“(光绪四年)冬十二月廿一日,长女同薇生”,“(光绪六年)冬十二月廿二日,次女同璧生”(Lo, *K'ang*, pp. 34, 36)。罗氏于页145注〔8〕中指出有为所示同璧生日不确。事实上,她生于1887年,即光绪十三年,并非光绪六年(1880)。有为及其妻妾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早夭,见《补遗》,页15、44、51;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74;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175。

〔7〕《补遗》,页23、64;Lo, *K'ang*, pp. 193, 227。

〔8〕《年谱》,页14;Lo, *K'ang*, p. 76。

〔9〕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计21卷。戊戌年(1898)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10〕《补遗》,页3。Lo, *K'ang*, p. 183未及此。

〔11〕《罗文仲伟昌先生行状》(稿本),页1、3、4、20。另见《补遗》,页30;Lo, *K'ang*, p. 196。